

实干民主不拘一格

何惜薇；陈可扬

联合早报，2019年6月30日

“你实际工作所获得的宣传，可能不如持反对立场的职业机会分子的言论所取得的效果，但這些在消退多時后，你所做的會強化实干民主（democracy of deeds），而不是空談民主（democracy of words）。”

1971年8月14日，時任外交部長拉惹勒南在一場社區活動上，首次應用他獨創的“实干民主”一詞，告訴基層志工，新加坡所需要的民主是一種以行動彰顯的民主、解決實際問題的民主，而不是高談闊論的民主。

當時，由於反對黨社會主義陣線議員早在1966年集體退出國會，因此中英報章的報道並沒聚焦於实干民主的論述，反而著重拉惹勒南對一黨國會的看法。拉惹勒南認為，多黨國會相對更會危害民主或忽視人民利益。

倒是48年來，執政黨領袖不時引述拉惹勒南的看法，敦促舉國上下風雨同舟，最近發出類似論調的是第四代領導團隊（4G）靈魂人物王瑞杰。

本月15日，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杰在“群策群力，共創未來”對話會上，呼喚民眾群策群力，共同構築一個“不斷以行動彰顯民主的社會”，他想要讓國人有更多機會直接參與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

“大社會” vs “大政府”

針對王瑞杰進一步詮釋了國家先驅領袖的理念，新加坡國立大學政策研究所副所長許林珠博士認為，隨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意味著原本已是多元文化的社會，由於社會和經濟條件的提升，需求也日益呈現多元。

“公民和企業的志向更高，對政府的要求也更高，但他們其實已擁有更多資源和點子，可決定要從生活中得到什麼，以及如何達到目標。”

這形成對“大政府、大社會”的需求，企業和社會不再只是在社會邊緣扮演角色，而是希冀政府負責協調或共同創造的職務。

許林珠舉例，社會企業應運而生，並不出自政府之手，但政府為它們提供部分財務援助或成立機構協助宣導。在對抗糖尿病公民審議團（Citizens' Jury）、著重幫助弱勢家庭孩子的“提升”（UPLIFT）跨部門工作小組，以及“樂齡支援網絡計劃”（Community Network of Seniors）的組織與服務，都是政府與社區和個人等共同發起倡議。

4G強調與人民一起努力

在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慶文看來，“協商”是前總理吳作棟和現任總理李顯龍領導風格的重要一環，王瑞杰強調“不斷以行動彰顯民主”，為協商的做法注入了新生命；第四代領導班子（4G）不再著重於“為何須協商”，而是“如何進行協商”。

陈庆文说：“王副总理是在阐明4G与新加坡人之间定下政治契约的本质……4G强调的是与人民一起努力，不仅仅是为人民而努力。”

陈庆文留意到王瑞杰的演讲至少四次强调权衡得失的重要，意指国家资源有限，必须考虑不同群体的需要。但陈庆文认为，应该跳脱“工作与生活难以平衡，要取得经济增长就得牺牲社会平等或环境可持续性”的二元化思维，政府要更具创意地协助完成各种由下而上的志业。

实干民主vs空谈民主

陈庆文和钻研领导课题多年的写作人许木松都认为，政府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关键因素是行动而不是言论。

许木松也说，“实干民主”与“空谈民主”对立，这可能导致任何形式的观点都被视为空谈，而问题的关键是“有些人确实只是想提出观点，其中包括学者等知识分子，他们可能觉得没资格在重大课题上有大动作”。

他相信，多数人民不会试图了解实干民主这个深奥的“政治术语”。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蓝平儿博士也有同感。他说，立国一代和更年轻的国人，都对信约里“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等字句十分熟悉，但是对于实干民主则十分陌生。

他也担心，务实的政府会被视为过于强调“实干”，忽视了“民主”，即政府依然扮演主导的角色，导致原本由下而上的志业，沦为由上而下的项目与活动。

“民众也会质问：执政党又是如何以行动彰显民主呢？举个例子，大家都关注（政府）执行“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令”（简称POFMA）时，法令会不会用来对付反对党。”

在落实实干民主方面，许林珠的问题则是：“任何一项政策出现问题时，哪一个部分是政府必须采取行动的，哪一些是基层会有更好解决方案的？历史又是否遗留了让政民难以相信对方心存善意的问题？他们也会质疑对方会否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推进共同目标。”

科技是“双刃剑”

即便对实践实干民主持有不同的看法与担忧，受访的学者专家都认为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社交媒体大行其道，政府不得不正视如何把触角伸向民众的问题。

许木松说，网络平台赋予民众权利，让他们更愿意踊跃发言，也有更多人更愿意以行动实践自己所相信的事。

“当任何人都能拍下人事物呈交政府机构、国会议员，甚至是总理的时候，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平衡有了调整的必要性。这也正是4G强调与人民建立伙伴关系的原因。”

研究社交媒体与政治的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孙婉婷博士则强调，科技向来是“双刃剑”，网络空间近期因充斥假新闻和假信息而备受诟病，但科技也带来巨大好处，包括为实践实干民主提供平台。

例如，台湾虚拟政策交流平台vTaiwan就让民众参与治理，在诸如是否应管制优步电召车服务以及网上售酒等课题上征求意见。

孙婉婷也说，“群策群力，共创未来”对话会不仅有关政府与公民合作，也强调公民相互合作。“公民过去多次应用科技为社会做出贡献，并改善大家的生活。2013年沙斯病毒肆虐期间，就有新加坡人开设面簿页面，筹集口罩并动员分发口罩。”

实干个案①

协商解决野猫问题“他们不忍心看到猫饿肚子，也因为野猫太常被人道毁灭，所以挺身而出帮助这些弱小的动物。”

在王振光（46岁）眼里，主动解决野猫问题的猫福利协会义工或者喂养社区猫的爱猫者，都是充满爱心和正义感的人。

控制野猫繁殖 结扎奏效

猫福利协会（Cat Welfare Society）1999年成立的时候，每天平均有35只猫被人道毁灭，一年之中被捕杀野猫多达一万余只。

一群爱猫人士觉得这样的措施虽然有效但未免太残忍，因此呼吁当局把捕杀野猫的行动改成为猫执行绝育手术，以控制野猫的数量。

后来他们更为野猫植入微型晶片，记录这些小动物平时由谁在照料，有需要的时候可直接找到爱猫人进行沟通。

协会的努力相当有成效，根据协会网站，2015年一整年被人道毁灭的猫减至1000只，组屋区的猫多数也已结扎，这些都是协会义工努力的结果。

教育爱猫者 调解猫纠纷

协会的工作也包括教育爱猫者，比如要求高楼养猫者为门窗安装防护网栏，以免好奇心强烈的猫从高楼跃下或者出门探险，对邻居造成困扰。

不过，爱猫者和居民之间的纠纷还是时有所闻，市镇理事会或者国家环境局等机构接到相关投诉时，就会联络猫福利协会义工帮忙调解。

当了10年义工的王振光调解经验丰富，他回答《联合早报》询问时指出，协会义工通常会采取比较柔性的方式进行劝导，这会比直接让当局介入的强硬做法有效。

目前猫福利协会义工人数不少，但王振光希望更多人挺身而出，最好每一座组屋或者每一个地区都有志愿者帮忙。

“最有效的是住在同一地区的义工出面劝说，因为大家都是邻居，有着共同的利益，说的话大家会比较听得进去。”

实干个案②

邻里学生在波涛中找回自信樟宜帆船俱乐部6月学校假期第一周迎来了百多名中学低年级学生，他们来自七所邻里中学，从来没接触过帆船，更没有在海上遨游的经历。

为了让邻里学校初中生一尝扬帆的滋味，并从中学习重要的生活技能，义工组织Metazone创办人陈成康（57岁，私募基金创办人）自2014年开始每年主办帆船营，给这些学生一个在浪涛中感悟生活技能的机会。

这些学生首先会通过一系列陆上和海上活动建立彼此的默契，然后在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志愿者的带领下出海，体验扬帆的乐趣。

28家机构和企业的高管也参与这个计划，一群总裁、总经理级别的高管会和学生分享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并在各自的企业接待学生到访。

这些学生也会一本正经地坐在企业会议室里讲述自己参加活动的体验，除了磨炼表达能力，也培养自信心。

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学习合作

陈成康谈到帆船营的意义时指出，让遭遇挫折的学生有机会改变思维定式，让他们通过掌控一艘船的航行方向建立自信，也了解到自己的决策如何影响他人。“如果学生不维持帆船上的平衡，不懂得照顾同一条船上的伙伴，这船就会翻覆，因此他们得学会怎么跟别人合作。”

至于学校选派哪些学生参加活动，陈成康说他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了参与计划的学校校长。

“他们最了解自己的学生，知道哪些学生可从帆船营活动中受益……有些学校派来的是课业不理想的学生，一些可能是纪律有点问题的学生，也有可能是家庭环境不理想的孩子。”

聆听学生困扰 提适当建议

志愿者王颖聪（26岁，机械工程师）自三年前就开始成为这些中学生的“大哥哥”，除了带他们体验海上航行的乐趣之外，也细心聆听中学生的困扰，帮助他们建立信心。

“这些孩子面对家庭问题、学业问题，一些甚至有交际问题，交不到朋友。身为‘大哥哥大姐姐’，我们聆听他们的困扰，给予他们相应的建议。”

王颖聪透露自己是在理工学院毕业之后才考上大学，而参加帆船营的中学生很多是普通课程学生，原本觉得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任务，但经过和王颖聪交流之后，发现自己努力一把，还是有机会的。

“现在就有一些前几年参加活动的学生找到了自信，开始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他们有些回来当大哥哥大姐姐；看见他们的成长，我很有满足感，希望未来能够帮助更多人。” 实干民主是什么？